



# AI时代：专业何用，教师何往，高校何存

■本报记者 陈彬

图片来源：摄图网

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要素，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只要谈及高等教育，专业、教师及高校似乎天然存在且不会消失。然而，在人工智能(AI)飞速发展，并以颠覆性力量渗透高等教育各个环节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共识”似乎正在动摇。

伴随着AI越来越“能干”，人们对于其取代部分教师或高校人才培养功能的争论也越来越多，而AI所导致的行业结构飞速变化，也让很多人开始质疑专业对于学生职业发展的重要性是否一如既往。

近日，在《中国科学报》组织的一场网络对话中，三位来自高教领域的学者便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

## 专业：不是无用，而是回归思维训练的核心

这场讨论的起点是一位网友的留言：“随着AI的大发展，大学上哪个专业是不是没那么重要了？”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大学是分专业的，但是社会是不分专业的。”在郭英剑看来，上大学的核心价值在于大学本身的培养过程，而非单纯的专业选择。本科生难以凭借四年的专业学习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数学、物理、外语等专业的学生皆是如此。

AI的到来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知。“AI时代，知识获取的成本大幅下降，学生只需借助智能工具就能快速查资料、整理信息、生成初步答案，这使传统课堂中以基础知识传授为主的专业教学模式价值不断被弱化。”郭英剑直言，大学若仍将基础知识传授作为专业教育的重要目标，将逐渐失去吸引力，专业也不会再把全部精力放在被动接受专业知识上。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一些人认为与其纠结于专业选择，不如追逐热门领域。但郭英剑也提醒，否定专业知识的单向传授，并不等于否定专业学习的价值。“专业的冷热瞬息万变，今天的热门专业可能不久后便面临人才过剩，与其焦虑专业选择，不如将精力放在扎实的能力培养上。”

对于所谓“专业无用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则明确提出反对，并表示专业学习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学生进行规范性的学科专业思维训练，这是其不可替代的根本意义。

“普通人对事物的看法是日常议论，但专业人才的判断是理性分析，这种差距的根源

就在于专业学习带来的学科化、专业化思维培养。”别敦荣说，比如，学习经济要建立经济学思维，学习工程要建立工程思维，学习医学则要建立临床思维，这种专业思维的塑造是保证大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工作专业化、认知理性化的基础。

对于现实中很多毕业生就业与专业不符的现象，别敦荣直言，这并不能否定专业学习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此类学生往往要经过长期的在职学习和训练，才能适应非本专业岗位要求。这恰恰说明，专业思维的缺失会让从业者在职场中遭遇无形的阻碍。

“相比讨论专业是否重要，我们更应反思目前的专业办学是否脱离实际、专业教学是否缺乏思维训练，而非专业本身存在的价值。”别敦荣表示，专业学习形成的思维能力是学生专业判断力、批判性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的基础，若忽视专业学习，将导致各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言，都是潜在的隐患。

“现代大学办专业、学生学好专业是天经地义的，专业永远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核心载体。”别敦荣说。

## 教师：不会被取代，但必须完成角色重塑

与专业类似，由于AI大幅降低了学生获取知识的门槛，未来高校教师是否会被AI取代也成为很多人思考的问题。

“AI不会取代教师，但一定会改变教师。”郭英剑表示，如果未来教师仅承担知识讲授的单一角色，确实会受到AI的巨大冲击——后者所讲授的基础知识更系统，传播得更快，还能根据学生的认知情况进行个性化解释，在简单的知识传授层面，教师并不占优势。

不过，大学教师的角色从来不止于“知识的搬运工”。

郭英剑认为，AI进入课堂后，教师角色将迎来三大核心转变，其育人价值也将在转型中进一步凸显，这种价值是AI无法替代的。

一是从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学习设计者。过去课堂多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教学结构单一，而在AI时代，知识随时可获取，课堂的意义不再是讲授知识，而是设计科学的学习过程。“未来优秀的教师，不是讲课最多的人，而是课程设计能力最强的人。”郭英剑说。

二是从信息提供者转变为思维引导者。AI能快速给出问题的答案，但无法告诉学生哪个答案更可靠、逻辑是否成立。此时，教师的价值便体现在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帮助学

生拆解复杂问题，识别信息中的逻辑漏洞，看到问题的多种解释维度，教学生如何判断答案、验证答案。

三是从以课堂中心转变为学习共同体的组织者。未来的大学课堂将打破单向讲述的传统模式，转向讨论、合作、项目学习和跨学科探索。教师的角色也将从讲授者转变为组织学生开展学习的协调者，将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学生组织起来，共同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

郭英剑强调，AI不仅没有降低教师的价值，反而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不仅要掌握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还要理解技术如何改变学习方式，学会将AI工具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

别敦荣也表示，单纯从事流水线式知识传授的教师，未来确实面临被AI取代的风险，但当前高校教师队伍面临的现实困境是，除相关领域的专业教师外，多数非专业教师对AI技术并不熟悉，甚至存在技术恐惧和排斥心理，不少人文社会科学教师更是对新技术抱有抵触情绪。在此背景下，提升教师的AI素养已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作为理工科的一线教师，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从教学实践角度印证了教师队伍的AI适应困境。

他表示，目前高校教师整体尚未完全接受AI，部分教师仍在沿用十几年前的讲义和课件，仅对内容进行简单的手动调整，便继续用于教学，对AI的学习和应用存在明显滞后性，尤其是年龄较大的教师，思想观念相对保守，接受新技术的速度较慢。

“与此相对，学生使用AI的普及度已远远超过教师。”马臻说，如今的大学生几乎都会在学习、作业、科研中使用AI工具。在此背景下，教师无法拒绝AI，只能主动学习，将其作为辅助教学、科研的重要工具。

针对目前高校教师群体中出现的问题，别敦荣直言，不少高校仅通过发布AI使用指南来规范师生行为，这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

校方认定在考试中违规使用生成式AI。然而，该生对此却予以否认，声称指控存在严重漏洞。该事件折射出高校在AI学术不端认定与监管中的双重困境——既存在AI使用核查手段准确性的争议，也暴露出针对学生使用AI事前预防、过程监督机制的缺失。

破除事后惩戒惯性，必须推动从“末端治理”向“全链条治理”的转变，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要强化事前预防。高校要通过学术道德讲座、AI使用失范案例剖析、校规校纪宣讲等方式以案明纪，让学生明确AI使用造成学术失范的行为界定与后果，增强自律意识和对学术规范的敬畏感。

其次要完善过程监督。高校要将监督延伸至课程论文、科研项目、毕业设计等各个环节。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在AI使用规范中，均明确要求教师对学生AI使用行为进行全程指导核查；部分高校更是要求学生在学术创作、科研实践中，如实披露AI使用的环节、工具与内容，实现AI使用行为全流程可追溯。

再次要强化技术监督。依托AI内容检测平台的生成痕迹识别、原创性比对等功能，精准发现学生AI违规生成、抄袭剽窃等行为，同时坚持技术检测与人工审核相结合，避免误判。

最后，学术期刊也要从成果发表端形成监督合力。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2025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发布的《关于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声明》。该声明要求投稿作者若非在核心、创造性环节使用AI，需随稿提交情况说明，详细披露工具名称、使用环节、生成内容记录等信息，编辑部及审稿人依据说明对稿件的研究过程、原创思想进行综合评价，从终端倒逼大学生规范使用AI。

“一份指南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高校需要思考的是，应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哪些AI技术的学习支持，如何建立系统化的教师AI素养培养方案，而不是简单地划定规则、推卸责任。”他说。

## 大学：形态必变，但核心价值无可替代

“未来大学会不会消失？”随着AI技术的发展，这一问题也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甚至有极端观点认为，未来人们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能通过线上平台完成大学教育，大学的物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态都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对此，别敦荣直言，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其社会性是技术工具无法复制的，这种社会性也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魅力所在。“教育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思维碰撞、情感联结和价值观塑造，这些都是线上学习无法实现的，也是AI技术难以模拟的。”

他同时强调，大学不会消亡，并不意味着传统大学的形态可以一成不变。面对AI冲击，大学需要主动接纳AI技术，进行教育教学的深度改革。

具体而言，要将适合AI的工作交给AI，如基本的知识传授、信息检索、作业批改等；把师生共同建构的内容打磨得更好，如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跨学科问题的探究等。

“只有通过这样的改革，让大学形态适配新时代的要求，才能让大学在AI时代保持活力。”别敦荣说。

郭英剑也表示，大学的形态会一直存在，但大学的数量可能会逐渐减少，高等教育领域需要为这一变化做好准备。

他认为，大学的核心价值并非知识的传授，而是培养学生那些AI难以替代的能力——判断力、问题意识、综合分析能力、社会协作能力等，而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大学提供具体的场景、专业的引导和社会化的环境。

“AI最擅长处理单一、标准化的任务，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往往是复杂且多元的，需要结合专业知识、社会经验和价值判断才能解决，而大学正是培养这种综合能力的最佳平台。”郭英剑说，这也是大学无法被线上平台取代的关键原因。

马臻则从理工科科研和教学的实践视角，印证了大学作为实体平台的不可替代性。他表示，大学能为师生搭建跨学科的AI研究平台，提供AI与专业融合的教学场景，整合师资、设备、科研等各类资源，这是线上学习和智能设备无法实现的。

以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为例，马臻介绍，该系一年多前便成立了环境科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近20位老师从事AI与环境科学交叉领域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国际期刊论文；同时开设了“环境科学+AI”双学士学位专业，将AI技术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吸引了众多学生报考。

“这些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实践，需要大学作为实体平台来推进，单一的线上平台无法完成这样的资源整合和能力培养。”他说。

“总之，大学的价值不在于物理空间的存在，而在于为学生提供社会化的学习环境、综合能力的培养平台和价值观的塑造场景。”马臻表示，不管是复旦大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还是很多学校目前开展的书院制教学，都是大学核心价值的生动体现。“这些核心价值是AI技术无法替代的，也是高等教育在变革中需要坚守的根本。”

## 从“抽象要求”到“具体指导”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大学生AI使用规范的教育，本质上属于学术道德教育。在这方面，国内高校普遍存在明显“填鸭式”说教问题，主要表现为以文件宣读、理论讲解为主，内容多为抽象的学术规范要求，与学生真实学术场景脱节。

这种教育方式明显忽视大学生的主体认知特点和学术研究习惯，学生难以真正理解AI使用的伦理边界，也无法快速掌握规范应用AI的具体方法。学术道德教育沦为“纸上谈兵”，难以内化为学生的行为准则。

这一现状要求高校在开展相关教育活动时，需立足AI时代学术道德教育需求，将规范使用AI从“抽象要求”转化为“具体指导”。

具体而言，一是将相关教育融入课程思政。应打破学术道德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壁垒，将AI应用规范、学术诚信、伦理底线有机融入课堂讲授、实践训练、科研指导各环节。教师需要结合学科研究特点，引导学生思考“AI辅助下如何守住学术底线”等现实问题，让学生在专业学习中理解学术规范的内涵和价值。

二是强化实操指导。通过开设AI学术规范专题工作坊，将规范使用AI的技能嵌入实验课程与科研实训等方式，针对性指导学生掌握AI生成内容的规范标注、审慎核验、合理引用等具体技能，让学生在真实科研情境中学会区分AI辅助与AI代笔，实现“做中学、用中悟”。

三是互动式教育激发学生主体自觉。可采用案例研讨、情景模拟、学术辩论等互动方式，围绕AI学术应用的伦理问题与失范案例组织学生深度研讨，让学生成为学术道德建设的主体，在思辨中深化对AI应用规范的理解，将学术诚信内化为行为自觉。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如何恢复大学课堂教学的吸引力，让课堂教学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目标相匹配，一直是大学教育和管理的核心问题。有关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关心大学成长的有识之士也从各自专业视野出发竭力加以推动。2025年9月至今，《中国科学报》以“如何挽救大学‘发霉的课堂’”为主题，组织发表的多篇大学师生评论，就是这一努力的积极体现。

此处之所以用“恢复”而不用“提高”一词，是因为当我们谈论当下国内大学课堂教学水平，往往会与20世纪80、90年代大学课堂教学水平相比较。客观地说，如今的中国大学课堂在知识规范化和内容专业化方面已远超以往，但在课堂氛围、教师的精力投入及学生的积极性、专心程度上，明显是今不如昔。

拿目前备受关注的课堂“抬头率”来说。它从1999年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国内实施后开始逐渐发酵，目前已成为大学课堂的一大“奇观”。按照管理者的行政习惯，出现了“抬头率”降低的问题，就抓这个问题，诸如提倡少用电子设备，上课时收缴或禁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均属此类。结果自然是“抬头率”低的问题没解决，又平添了其他问题。

现在看来，课堂上学生“抬头率”低，直接影响到的是教师，批评和抱怨的也主要是教师。学生似乎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教学是双向交流：一方认为问题严重，努力寻找解决之道；一方却抱持不在乎的态度，这正是问题所在。

在如今的中国大学课堂上，“抬头率”问题引出的“不听课”很可能只是源自“世代差”的一种假象。因为“Z世代”的大学生本是所谓“数字原住民”，他们长期通过手机和电脑等工具学习，已经养成了不关心授课者的习惯。教师在他们眼里只是一种“数字形象或符号”，哪怕是新学期教师第一次上台，也很少能看见有学生抬头表示出一点好奇心。换言之，低头听课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在听，所以教师提问时可以说出个一二；但他们同时也在做自己的事，因为课程只是诸多选项之一，学生可以同时兼顾其他事情。在他们看来，一门课程只是大学期间众多课程之一，甚至只是代表若干学分或成绩的抽象数字。

与此同时，有些教师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方法上仍以“不变应万变”，仍希望以自己的认知规范学生，以为自己讲授的课程意义非凡，将左右学生的未来。殊不知，学生成才的范例都存在于事后的追忆之中，而非事前规范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教育的特点，不如说是难点更合适。可惜现在流行的大学“教学评估”走的也是居高临下的规划之路。一门课与“毕业要求”的“达成度”被细化到各个方面，如果真的如此，不仅一门课的作用是“万能”的，而且“树人”的效果也不再需要“百年”，而是立竿见影。

“Z世代”在“众星捧月”的家庭环境下长大，不仅是在家庭中“以自我为中心”，在学校里也一样。这必然与“师道尊严”的观念产生理念上的冲突。从“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出发，他们也觉得困惑，明明老师天天在讲要有“自我意识”，学会“自我选择”，但当他们按自己的想法选择“不抬头”时，却不被接受。

一切围绕着“个人需要”，自然不会顾及教师的感受。而“Z世代”的“个人需要”也并不单纯，它同样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他们上课可以不抬头、不记笔记，却会在领导面前“表演”记笔记。

“Z世代”的另一个特征是“注意力分散”。据笔者观察，如今的学生能够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听教师讲授的极限已经缩短到20~30分钟，过了这个极限，哪怕讲得再精彩，学生也可能走神了。

教师批评和抱怨课堂上学生“抬头率”低，而学生对此不以为然，造成这一反差的根源，当然与“世代差”有关。“世代差”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可能完全克服，但通过调整大学管理机制，对其进行有效平衡是可以做到的。

平衡“世代差”的关键是相互了解。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大学里有个惯例，就是学校或学院(系)领导定期向教师介绍学生的最新动态。它让教师了解学生的同时，也产生“本校一员”的责任感。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个惯例突然被“精简”，教师了解本校情况反而要借助互联网。

看来，恢复好传统，为师生创造自然宽松、非功利性的相互了解的机会和条件应是扭转大学课堂教学吸引力下降趋势的当务之急。只有相互了解，才可能让教师不再为“抬头率”所困，让教学有的放矢，并重获尊重；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进而加深对大学课堂教

## 平衡「世代差」方能重塑课堂吸引力

■尤小立

# 大学生AI教育应从“抽象要求”转向“具体指导”

■丁义浩 仲一帆

当前，人工智能(AI)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深度普及正深刻重塑学术科研生态。凭借在文献检索、数据分析、逻辑梳理和学术写作辅助等方面展现出的显著优势，AI大幅提升了大学生的科研效率。然而，其应用边界尚不清晰，学术伦理规范与监管体系尚未健全，也滋生出AI代写、洗稿、伪造数据、成果虚假标注等学术失范问题。

2025年8月，教育管理数据与咨询机构麦可思发布的《2025年高校师生AI应用及素养研究》显示，有65.9%的受访在校大学生直接或间接面临AI学术争议风险，其中42.0%亲身经历过因AI生成内容引发的学术纠纷，如抄袭判定、作业扣分等。

学术研究是追求真理的认知过程。人的主体性思考与原创性探究是学术能力提升的关键，而AI仅能作为数据处理、文献梳理等环节的辅助手段，无法替代人的思考、判断与创造。这要求高校科学平衡技术应用与能力培养、效率提升与品格塑造的辩证关系，引导大学生善用AI，不要将AI作为投机取巧的工具。

## 尚待明确的规则边界

当前，AI已深度嵌入大学生课程作业、科研实践、毕业设计等多个学术环节，但配套的大学生AI学术应用规范却存在规则缺位、口径模糊、约束乏力等问题。

这导致AI使用环节如何确定、使用程度如何把控、生成内容如何标注、违规行为如何界定与处置等关键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也让部分心存侥幸的学生钻了规则空子，将AI辅助变为AI代笔，把未标注AI使用当作合理操作，既违背学术诚信原则，又破坏学术公平，消解学术研究的真正价值。

在笔者看来，补齐规则短板，让大学生用

AI开展学术研究有章可循，是规范AI应用、培育学术道德的关键举措。对此，高校需结合大学生学术场景与认知特点，从适用范围、标注要求、违规处置等维度，制定针对性强、实操性高的AI应用规范。

在这方面，国内多所高校已率先开展实践探索，并形成了可借鉴的范本。比如，清华大学发布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指导原则》，特别针对研究生群体提出规范要求，强调禁止使用AI代替本应由本人进行的学术训练，严禁将AI生成内容直接用作学业成果。

再比如，华东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发布国内高校首份针对学生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学生使用指南》，要求AI直接生成内容标注，且占比不超全文内容的20%；同时，学生需对AI生成内容的准确性、知识产权、数据隐私等进行自查核验，并承担最终责任。

这些实践从原则框架与实操标准层面，厘清了大学生AI学术应用的“可为”与“不可为”，值得其他学校借鉴。

## 事前预防与过程监督

长期以来，部分高校针对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管理，已经形成了“发现问题—追究责任”的事后惩戒惯性模式，工作重点集中在查处、惩戒等末端环节。然而，借助AI实施的学术不端行为具有成本低、操作简单、隐蔽性强等特点，与传统学术不端相比，前者更难以识别核查，单纯依靠事后惩戒，既难以精准发现学生的隐蔽失范行为，也无法挽回学生在学业成长、学术素养培养中的实质性损失，还容易让部分学生产生侥幸心理。

2024年11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开除了一名博士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原因是他被

校方认定在考试中违规使用生成式AI。然而，该生对此却予以否认，声称指控存在严重漏洞。该事件折射出高校在AI学术不端认定与监管中的双重困境——既存在AI使用核查手段准确性的争议，也暴露出针对学生使用AI事前预防、过程监督机制的缺失。

破除事后惩戒惯性，必须推动从“末端治理”向“全链条治理”的转变，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要强化事前预防。高校要通过学术道德讲座、AI使用失范案例剖析、校规校纪宣讲等方式以案明纪，让学生明确AI使用造成学术失范的行为界定与后果，增强自律意识和对学术规范的敬畏感。

其次要完善过程监督。高校要将监督延伸至课程论文、科研项目、毕业设计等各个环节。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在AI使用规范中，均明确要求教师对学生AI使用行为进行全程指导核查；部分高校更是要求学生在学术创作、科研实践中，如实披露AI使用的环节、工具与内容，实现AI使用行为全流程可追溯。

再次要强化技术监督。依托AI内容检测平台的生成痕迹识别、原创性比对等功能，精准发现学生AI违规生成、抄袭剽窃等行为，同时坚持技术检测与人工审核相结合，避免误判。

最后，学术期刊也要从成果发表端形成监督合力。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2025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发布的《关于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声明》。该声明要求投稿作者若非在核心、创造性环节使用AI，需随稿提交情况说明，详细披露工具名称、使用环节、生成内容记录等信息，编辑部及审稿人依据说明对稿件的研究过程、原创思想进行综合评价，从终端倒逼大学生规范使用AI。